

zhongguo jindai jun xi congshu

刘立勤

teng
jun

中国近代军系丛书

新军



山西人民出版社
sh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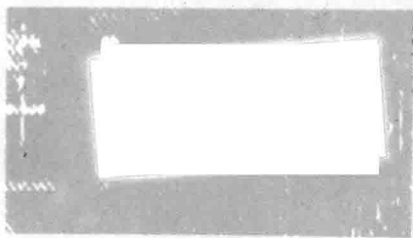
ZHONGGUO JINDAI JIN XI CONGSHU

ZHONGGUO JINDAI JIN XI CONGSHU

中国近代军系丛书

刘立勤

奉军



 山西人民出版社
SH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责 编：张彦彬
复 审：来普亮
终 审：崔元和
责任印制：李 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奉军 / 刘立勤, 李涛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9.9

(中国近代军系/田玄, 皮明勇主编)

ISBN 7—203—03868—8

I. 奉… II. ①刘… ②李… III. 奉系军阀—军事史.
IV. E296.9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3203 号

中国近代军系丛书

奉 军

刘立勤 李 涛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建设南路1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125 字数: 365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册

*

ISBN 7—203—03868—8

K·180 定价: 24.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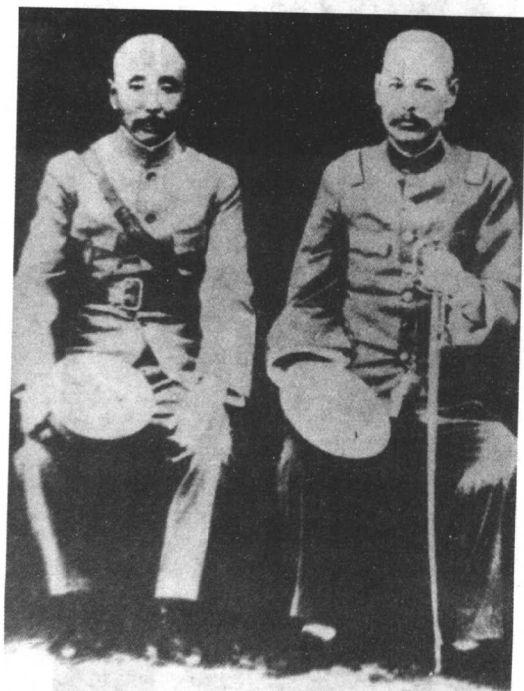
◎张作霖着戎装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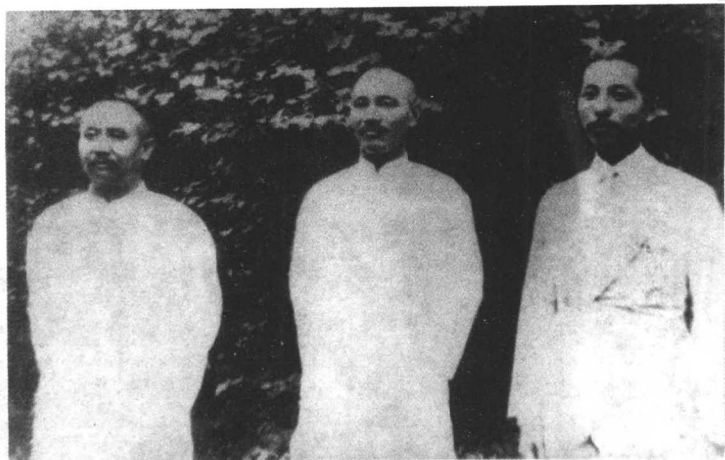
◎受招抚后任清军统领之张作霖



◎张作霖的第五夫人



◎张作霖(左)与吴佩孚合影



◎张学良(右)和蒋介石(中)、阎锡山(左)在北平外交大楼前



◎1930年蒋介石在私邸接见张学良时合影。左起:张学良、宋霭龄、于凤至、宋美龄、蒋介石



◎冬日张氏帅府大楼



◎帅府舞厅(帅府办事处)



张作霖与五子学森六子学浚着元帅戎装合影



◎ 张学良
就任国民军陆
海空军副司令
时照



◎ 张作霖民国 14 年照



① 张学良 1927 年照



② 张学良 (前左) 于 1930 年 11 月 12 日抵南京与蒋介石及欢迎者的合影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学良
(右)和张宗昌(中)、直隶督办褚玉
璞(左)合影



张学良(右)任三、四
方面军团长时与他的代表
胡愚(左)合影



◎ 1930 年张学良到南京时,蒋介石的代表张群到码头迎接



◎ 1930 年张学良(前左)和蒋介石(前右)在中山陵

序

武装力量是国家或政治集团的各种武装组织的总称，一般以军队为主体，由军队和其他正规的、非正规的武装组织组成。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军队、军事集团，亦称军系）的形成发展、沿革、编制体制、军费军晌等与国家、民族及社会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并对社会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自 19 世纪 40 年代初鸦片战争以来，至 20 世纪 20 年代初年出现了新的特点，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破坏，并逐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打破了中国固有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在封建地主阶级之外又出现了一个为外国侵略集团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在这一新特点下，武装力量及军事政治集团等遂成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在这段历史中间，军队及军系逐渐由古代军队向近、现代过渡，并经历了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战争以及大规模的、连年的军阀混战，由此出现了中国近代军系十分复杂的变迁活动。

中国晚清社会所出现的湘军，即是中国近代军系的重要一支。淮军则为湘军首领曾国藩在剿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深感湘军兵力不足的条件上所组成的新的勇营武装，同为中国近代军系的重要一支。1897 年，清政府在论及清代制沿革时指出：“我朝定鼎中原，当时所用仅止八旗劲旅而已，无敌于天下；其后额设绿营制兵，多或六十余万，少亦五十余万，较之八旗不啻倍蓰。乃奥匪、捻匪、川匪……之乱，制兵竟不足恃，于是加饷挑练而有练军，招

募勇丁而有湘军、楚军、淮军、毅军”。曾国藩、李鸿章所办湘淮两大武装集团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而形成的。

曾国藩办团练的方针，是以封建宗法关系控制将领和军队。湘军各部，上自统领，下至哨长、士兵，从其开始招募成军，即是以同乡、亲友、师生家族关系和裙带关系为纽带而维系起来的武装集团。湘军营制为“帅欲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领自拣营官，营官拣哨官，以次下之，帅不为制。故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营哨，营哨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父兄焉。或帅欲易统领，则并其军撤之，而令新统领自拣营官如前制。或即其地募其人，分别汰留，遂成新军，不相沿袭也。”学者王闿运在论及湘军时说：“湘军之可贵者，各有宗派，故上下相亲”；又说：“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上述这些论及道破湘军的宗派性质。继之而起的李鸿章淮军，也是承袭湘军这套办法而形成的一支军队。湘淮军不仅营制一脉相承，其政治理念亦相当传统。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具有浓厚的封建忠孝义礼意识。

湘、淮军在镇压太平军、捻军之后，一部分军队裁撤，大部分留驻各地成为防军，并逐步取代原有的八旗、绿营而成为清朝的常制军队。随之而出现的是湘、淮军集团控制了全国许多省区军民两政的实权。清朝末年，湘、淮两个集团，长期分别盘踞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重要职位，形成相当大的地方势力，其间社会历史的重大问题，几乎都与湘、淮军集团紧密相关，成为近代中国举足轻重的军事政治集团势力。

湘、淮集团活跃于19世纪下半叶，在此后的半个世纪内，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在晚清，清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但是中央政权仍然具有相当的权威，它所使用的相互牵制等策略还能对湘、淮集团产生实

际的制约作用。因此，湘淮集团与清朝中央不仅在形式上存在着体制的联系，而且在实际上还受到这种体制的制约。随着近代社会的变迁，湘、淮等军系的消亡，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更大的、不断进行割据和争雄的军系——北洋军阀集团。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从1912年起至1928年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集团从小站练兵开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为止，中国的内忧外患，莫不在这个集团联系在一起。

北洋军军系，其起源可追溯至清末的湘军和淮军。

1901年袁世凯继李鸿章之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利用手中控制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以小站练兵时所形成的班底为骨干，一方面乘机扩充北洋军事力量，一方面不断在中央和地方安插亲信，由此形成了北洋军事政治集团。

袁世凯经营培植北洋军阀集团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培植亲信，组成宗派势力，并掌握了一支唯袁命是从的北洋新军，而这支军队“其心理中不知有清廷，而唯知有项城耳”。袁非常崇拜曾国藩“起自团练，创办湘军”的治军方法，并加以发展，在其手下网罗了一批忠于他的亲信、心腹、死党。北洋军事集团主要由三部分人构成：第一是追随袁世凯多年的“家兵家将”；第二是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第三是淮军旧将。这些人多生长于清王朝封建政治文化影响较深的北方农村，未成年时即受到军功发迹至显风俗的熏陶，具有极端强烈的求取功名和升官发财的欲望。尤其是北洋武备学堂的学生，他们大都出身寒苦，有着顽固的自强精神和极强的政治追求欲，而其在淮军“诸将领多以行伍起家，谓功名自马上得之，于军学多嫚语姗笑，……毕业诸生多淹滞伦僚”，由于这些人在淮军中得不到重用，迁升太慢，心理压抑甚大，一旦受人提拔，即产生较浓的为个人所用和报恩的思想。袁世凯把他们召至新建陆军，破格提拔为各级军官和教习。如号称北洋“三

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以及段芝贵、曹锟、李纯、王占元、陆建章、杨善德、卢永祥、鲍贵卿、张怀芝等均出身于这一学堂。

除了武备学堂毕业生外，袁世凯对“家兵家将”和淮军旧将亦加以笼络和提拔，袁世凯曾语，“到底不识字的人靠得住”，在新建陆军章制中，袁世凯订立了所谓“兼充”制度，即“统领以各分统兼充。分统以各营统带兼充，冀可省官节费”，实际上袁氏却藉此来控制其部属，凡是顺从和巴结他的将领便擢升兼充分统或统领。

袁世凯还通过自办的各类军事学堂培养效忠自己的军官。如新建陆军之初，即设“随营军事学堂”，培养新军干部。嗣后，1902年在保定设“北洋随营将弁学堂”，1905年设北洋军医、军械、经理等学堂。1906年设“保定军官学堂”，训练北洋新军扩军后的军事骨干。袁世凯规定“此后训练新军，所有军中委用人员，应先尽曾习武备暨曾带新军者选择委用”、“迨成军后，遇有官弁出缺，仍先尽学堂毕业之员选充”。袁用人的标准是任人唯北洋派是亲。北洋六镇新军的镇、协、标各级统兵官，几乎是清一色的北洋系，绝少外省武备学堂毕业生或外省留日学生。故北洋六镇的军事骨干，多是袁氏的门生故吏、视袁为衣食父母。

不仅如此，袁世凯还广为招揽其它类型的人才。1901年，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他的政治野心逐渐扩大。为了攫取更大的政治目标，他开始招揽各种政治人才进入他的幕府，其政治录用方式日趋多元化。一方面，吸收了大量受过封建政治文化影响的文治官员，一方面也吸引了其他政治集团的成员进入北洋集团，形成了北洋官僚集团势力，其一，袁世凯利用政治亲缘关系来网罗他的政治势力。明目张胆地将任用亲朋、乡党视为近代意义的结党。他所任用的亲信大部是亲朋、同乡、同僚、部属、门人、恩

人、结义、姻亲等。如徐世昌堪称是北洋官僚集团的幕僚长，他是在同袁世凯长期合作中与袁结成生死之交的。袁资助他进京应考，后考中举人、进士，做了翰林院编修。袁世凯将他调到小站，管理参谋营务处，以后又多次向清廷“保荐”他，使徐世昌从此平步青云。

唐绍仪在袁世凯镇压朝鲜“壬午兵变”时与袁结识，后充任袁世凯在朝鲜的翻译。甲午战争前夕，唐冒死护送袁世凯离开汉城，登舰返国。袁小站练兵后，就委任唐为营务处帮办，袁任直督后，唐一直追随左右，设立邮传部后，袁保荐他为该部侍郎，一手把持部务。袁世凯还将有亲友、同乡或家中用人的子弟关系之人安插于政治、经济部门，以便于自己控制。袁世凯最贴身的内务总管袁乃宽，是袁的同乡，后来认为本家，被袁委任协助控制军政机要和掌管金钱的要职。周学熙、刘永庆，张镇芳等人都因与袁世凯有亲属关系而为袁所重用。袁世凯还利用联姻来扩大政治亲缘关系网，以控制国内军政部门。其二，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后，继续以官位利禄为诱饵，网罗各种政客、文人、理财家为其所用。如朱家宝、齐耀琳、孙宝琦、张锡銓、杨士骧、杨士琦、赵秉钧等一帮文职人员即是在这官禄利诱下，进入北洋集团，而成为其重要干将的。其三，袁世凯善于利用“金钱效应”扩展自己的政治势力。在清末社会，传统的儒家政治准则已被抛弃，清王朝官场的腐败现象日趋表面化，卖官鬻爵、行贿受贿屡见不鲜。袁世凯在发挥“金钱效应”上，则无所不用其极。通过金钱途径，袁世凯陆续使领班军机大臣奕劻，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荫昌、太监会同李莲英等清廷内重要角色纳入自己的集团范围内。其四，袁世凯还善于利用政治投机来扩充自己的政治、经济实力。在清末社会，各种政治势力叠起，改革潮流澎湃，袁世凯则以“开通风气”自诩，屡屡上疏言新政，借以博取时誉，扩充自己的政治影

响。袁世凯通过举办新政，网罗了一批实业家和理财家，扩充了北洋集团的经济实力，同时也博得了北方中小资本家的信赖和支持。到了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立宪的小国日本战胜了专制的大国俄国，国内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要求立宪的呼声日益强烈。袁世凯集团也受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其政治文化亦融入立宪政治色彩。

由于以袁为首的北洋集团以立宪的政治文化相标榜，这一集团对国内外的立宪派人士都有很大的政治辐射力。留日学生金邦平、黎渊、李士伟等人回国后，纷纷投到袁世凯幕下。在立宪派中独树一帜的杨度，从日本回国后也转到袁世凯幕下，成为袁世凯宪政问题的重要参谋。

由于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势力的极大膨胀，至清末，北洋军阀军事政治集团，基本上控制了直隶、山东、江苏、安徽、河南、东三省等省区及中央一些部院的实权。1908年袁世凯遭监国载沣等皇族亲贵的猜疑被罢官隐居河南，但由于其亲信爪牙的维护，使清政府对其也莫可奈何。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东山再起，凭借北洋军系的实力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成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大总统。嗣后，在北洋军阀集团势力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历届总统、执政、大元帅、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各省督军、省长、镇守使等军政大员，多出自该军阀集团。此间，军阀集团势力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已发生了完全的逆转。中央的权威消失了，军阀实力派已经完全实现了军事力量与地方政权和财权的三者合一。因而，他们也就变得更加强硬起来，无组织、无原则则是公开的，肆无忌惮的。

1916年袁世凯病死，北洋军阀集团发生了分裂，其内部各派乘机发展各自的势力，帝国主义为争夺在华利益也各自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于是，北洋军阀分裂演变为三大派系：